

苏兆征对省港大罢工的贡献

丘均元

1925年,反帝烈火燃遍神州大地。正是“不惑之年”的苏兆征,饱含着革命豪情,并以鲜明的政治立场,积极参与发动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担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是确保罢工实现和顺利发展的重要台柱。他在为坚持罢工的实际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一)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在为支持上海人民反帝运动而爆发的各地罢工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是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成为五卅运动开始的全国反帝浪潮的中流砥柱,它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而苏兆征为发动和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竭尽全力。

1925年6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得到五卅惨案的消息后,准备立即发动省港大罢工,支持上海人民的斗争。但恰在这时,盘据广州的反动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广州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所以,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首先于6月2日组织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援上海人民的示威游行,同时也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为此,一方面先后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人赴香港发动香港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另一方面又派李森、冯菊坡、刘尔嵩等人在广州发动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并进行罢工后的各种准备工作。

香港称得上是苏兆征的第二故乡,也是他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1903年,由于生活所迫,18岁的苏兆征离开了家乡——广东香山县淇澳村(今属珠海市唐家区淇澳乡),到香港英国怡和洋行所属的一艘轮船“乐生”号做工,从此开始了海员生涯。“为一有名的老海员。”^①“他在船上与一般工人都非常亲爱,常努力排解工人的纠纷,并

勇敢的领导工人去反抗西人的无理虐待、打骂、及一切压迫，时常乘机煽动宣传，向工人说：“团结即是自己的力量”，所以工人对他都佩服信仰。”^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加坚定了苏兆征斗争的信念和决心。1921年3月，在他和林伟民的积极发动和组织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产业工会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1月，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成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新起点。自此之后，他为工人运动奔走呼号，英勇斗争，往返于香港、广州、北京之间，并于1925年3月在北京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从此，他不仅为海员工友奋斗，并且是为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了。”^③

上述可知，苏兆征在香港工人群众中是有很高的威信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这都为组织罢工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受命到香港后，为了组织罢工而废寝忘食地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是组成罢工领导核心。

鸦片战争后，香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侵占。在香港居住的中国同胞，长期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与压榨，其痛苦特甚。香港广大工人群众虽有强烈的反帝要求，但要团结起来举行罢工有其不少困难，且阻力重重。苏兆征等深刻认识到，要使罢工得以实现，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此，他与邓中夏、杨殷、黄平、杨匏安等五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团委员会，作为发动、组织罢工的领导核心。

二是改造、健全工会。

罢工前，香港虽有工会一百多个，但情况极为复杂，除少数工会如海员工会为共产党员所领导外，大部份操纵在黄色工会领袖手中。“这些工会的领袖，找不着一个是觉悟的或革命的。”^④为改造、健全工会，苏兆征等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发动。由于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处于风起云涌的反帝浪潮激荡下，香港工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要求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因此，经过短时间的工作，工人就发动起来了。另一方面游说于黄色工会的领袖。“因兆征同志平时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⑤

三是成立全港工团委员会。

苏兆征赴港后，于6月上旬至中旬与邓中夏等人在香港车衣工会和部份工会负责人举行数次会谈，商讨举行罢工事宜，决定成立全港工团委员会，作为发动香港工人罢工的领导机构。全港工团委员会成立后，苏兆征被选为干事局长，邓中夏为参谋长。

与此同时，广州方面，李森等人积极筹划罢工实现后的各种准备工作。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也同意拨给一笔款项，作为罢工工人的伙食费，并封闭了广州的一些烟馆、赌馆、妓院和闲散的祠堂、会馆，以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这样就解除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

经过一番准备和筹划后，香港工人的反帝政治大罢工于1925年6月19日正式爆发

了。是日，在苏兆征等人的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会首先罢工，接着，电车、印刷、洋务、码头搬运、煤炭、邮电等行业工人纷纷响应。先后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其中10几万工人冲破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威胁，分乘火车、轮船回到了广州。苏兆征仍暂留香港，继续发动罢工。6月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宣布总罢工，并成立了沙面工人声援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省港两支罢工工人队伍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反帝洪流，这就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23日，在广州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人民团体共10几万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对面的沙基时，遭到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开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日军舰开炮助威，制造了死亡52人，重伤170多人的沙基惨案。帝国主义又一次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更加激发人民的愤慨，促使更多工人投入反帝斗争行列，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

(二)

省港大罢工实现以后，10几万罢工工人云集广州，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向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省港大罢工之所以能够如期实现和顺利发展，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广东区委和罢工委员会党团的正确领导，共产党人做了大量的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但具体一点说，苏兆征则是这项工作中最艰苦的开拓者和最大的贡献者。

大罢工实现以后，首先面临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把10几万工人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邓中夏一开始就预见到这次大罢工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所以“必须有伟大缜密的组织”，“才能历久而不败”。为此，省港罢工工人曾举行代表大会，专题讨论了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领导机构等问题。1925年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告成立，苏兆征被推选为委员长，同时推选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长，邓中夏、廖仲恺等被聘为顾问。

省港罢工委员会由13名委员（香港7人、广州沙面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2人）组成。罢委会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审计局、铁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分头办事。总之，罢委会设立后，成了带领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而身为罢委会委员长的苏兆征，更是日理万机，为罢工斗争竭尽全力。正如邓中夏说的那样：当时“有隔日一开的八百余人之代表大会，有封锁香港的二千余人之纠察队，有法庭，有监狱，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有公共饭堂，有公共宿舍，有学校以供给工友学习，有检验货物处，有仇货拍卖处，有船支放行领证处（凡中外轮船来广州者皆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须领得证书方可放行），有骑船处（不拘中外轮船，皆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不准驶到香港）以封锁香港和检查仇货，在这样的庞大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几万。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

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⑥

应该着重指出，省港大罢工是在极其复杂条件下进行的，但它却坚持达1年4个月之久（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直到1926年10日才基本结束）。究其主要原因是罢委会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制定一系列措施，并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在这方面，苏兆征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就以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为例，省港大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大罢工。因此，罢工开始后，罢委会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因为五卅惨案、沙基惨案是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参与制造的，美帝国主义也是支持的。苏兆征也曾经提出这次罢工斗争应“团结全国各阶级，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的主张。^⑦与此相适应，罢委会曾采取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方针，明令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不准进入香港。这一做法，致使海外交通完全断绝。其结果，不只是封锁了香港，使帝国主义造成损失，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很不利的后果。罢工两个月后，苏兆征等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坚持实行全面封锁的政策，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看待，不仅不能利用其矛盾，有利于我之对敌斗争，可能会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对我，使我处于不利地位。为此，他与其他罢工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制订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接来广州”的政策。就是由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全面封锁改变为单独对英封锁，集中力量打击英国。这一政策实施后，迅速收到了很大成效。首先表现在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采取单独对英政策后，日本和美国的轮船公司、洋行，首先要求领证复业，并愿将香港、沙面的商店也迁来广州营业。在港美商大来公司还决定租轮自上海运货来广州，不经香港直抵黄埔。其他各国也效仿日、美闻风而来。总之，单独对英政策的实行，不仅拆散了帝国主义反对罢工的联合战线，而且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使香港当局一再叫嚣的要以十万大兵攻打广州的恐吓，完全破产。同时，这一政策的实施，也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不论在对外船运、商业、财政、税收等各方面都出现好的局面。这样也使商人有生意可做，农民的产品可以出口，因而也加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工商联合。

同时，罢工斗争开始后，国内亦出现极为复杂的局面，如内奸活动猖狂，他们反对罢工，反对革命。因此，协助国民政府肃清内奸又成为罢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协助国民政府肃清内奸方面，苏兆征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宣布继续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广东地区推行各种革命措施。这样一来，使一些反动军阀和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十分不满。他们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并与公开叫嚷进兵广州、推翻国民政府的军阀陈炯明、邓本殷遥相呼应，阴谋发动政变。他们还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在所谓“反共产”的旗帜下，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在此关键时刻，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首先揭露邓本殷接受香港当局的贿赂，准备出兵广东的阴谋，函请政府出兵讨伐邓本殷。苏兆征还专门发表题为《肃清内奸》的文章，指出：邓本殷是内奸，陈炯明也是内奸，还有名隶国民政府旗帜之下，实暗与帝国主义勾

结的也是内奸。因此，我们要下决心，先行肃清内奸，然后罢工可保，帝国主义可打倒。⑧随后由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组织了以罢工工人为主体的，约有10万人参加的肃清内奸，统一广东的示威运动大会。大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剪除陈贼余孽，解散不法军队，肃清反动势力，统一广东全省。并且表示，全体人民坚决拥护国民政府内外的一切革命政策，给国民政府撑腰壮胆。然而国民政府却动摇不定，不敢动手处理。结果，右派先下了手，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刺廖事件发生后，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大群众全力支持国民政府，以武力解散了参加密谋的各派粤军，并把与廖案有重大嫌疑的胡汉民、许崇智驱逐出了广东，使国民政府转危为安。总之，省港大罢工不仅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强大威力，同时还表现了苏兆征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正如1926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在《为省港大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中指出的：“你们（罢工工人）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光辉！你们在过去15个月中，以少数冻饿的无武器的群众，与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第一强大而凶恶的英帝国主义相坚持，你们非特没有失败，并且还给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以空前的打击——使他们损失了亿兆金镑，剥夺了他们在南中国贸易的权利，使香港变成荒岛，使大英帝国的威信空前扫地，——你们这种英雄的、有效的、长期的斗争，实为中国反帝运动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斗争。”⑨

（三）

把罢工工人组织起来以后，如何解决10几万罢工工人的费用问题，这也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大罢工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应该说，在解决罢工工人的费用问题上，廖仲恺功不可没。他曾以财政部名义，每日拨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经费。还饬令广州市政厅将征收半月捐租（后改一月）交中央银行专为罢工费用。并在各县征收股实绅商捐，拍卖所有没收的英商货物用以支持罢工工人费用。此外，还责成各华商烟草公司拨盈利部份捐助罢工委员会。⑩但我们认为，当时身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在财政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和建树的业绩亦不能低估，这是其对省港大罢工又一重大贡献。

苏兆征在理财方面，邓中夏有这样一段评述：“兆征一生都身兼财政，在海员工会中，在省港罢工中，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党的中央中，都是如此。在海员工会他管财政，每月必开会报告帐目一次，收据一总拿来听凭到会者查阅，并将帐目在会刊上按月登载。在省港罢工时，两日向代表大会报告帐目一次，又发行帐目专刊，送各工会审阅。省港罢工委员会每日进出动辄数万元，有时甚至数十万元，若不如此，何以能招大信。”⑪这一段评述，不仅说明苏兆征一生廉洁自守，收受无一私财，而且表明他是一位理财能手。

苏兆征经常对人说，财政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搞好这项工作，实际上掌握了罢工的经济命脉。因此，他在主管财政工作的过程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据当时

在会计部工作的回忆：苏兆征在财政问题上，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要求会计部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各项帐目处理得分毫不差，严格实行财经制度和纪律，说这是关系到十几万名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影响到罢工斗争成败的大问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在他的教育下，会计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勤勤恳恳，同心同德，有条不紊地工作，并且取得很大的成绩。^⑫

苏兆征在主管财政工作过程中，尽管敌人制造种种流言蜚语中伤他，说什么“苏兆征肥了。”工贼梁子光一伙也捏造事实，诬蔑苏兆征接受奸商贿赂，企图将苏兆征撵下台。但是由于他平日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定期向罢工工人报告收支帐目，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因此，广大罢工工人却始终信任他，把他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人和当家人。到了罢工后期，帝国主义者还主使一小撮反动分子制造了一起火烧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建筑物的事件。事件发生后，谣言四起，说什么苏兆征与会计部的人平日有贪污行为，这场大火就是他们互相勾结放的，为的是毁灭贪污痕迹等等。面对恶毒的攻击、诽谤，苏兆征却镇定自如，他在带领罢工工人重建罢工委员会地址的同时，一方面鼓励大家，要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坚持本职工作，并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慌乱，如果我们都乱了，罢工工人兄弟就会更加混乱起来。另一方面，他提议组织一个清帐委员会，负责清查会计部的帐目。清查结果证明，所有帐目一清二楚，分毫不差。

“这样一来，反革命制造的火烧东园事件彻底破产了，苏兆征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更高了。”^⑬

综上所述，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中，为组织、发动、领导罢工斗争呕心沥血，忠贞不渝。而这一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就从这意义上说，苏兆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甚为惋惜的是，苏兆征为革命一生勤劳，积劳致疾，于1929年2月25日病逝上海，终年44岁。逝世前曾留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要同心合力达到革命胜利”的遗言。这位“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审稿 唐上意〕

注

①⑤⑥⑪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王灼：《苏兆征同志事略》，《红旗》第17、18期

③ 《悼我们领袖苏兆征同志》，《红旗》周报第8期，1929年3月15日

④ 唐平林：《苏兆征与省港大罢工》，《苏兆征纪念册》，中华全国总工会编，1930年2月7日出版

⑦ 苏兆征：《反对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载《工人之路特号》第13期，1925年7月6日

⑧ 苏兆征：《肃清内奸》，载《工人之路》第14期，1925年8月7日

⑨ 《工人之路》第460期，1926年10月10日

⑩ 《双清文集》上卷，第80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转引丁旭光：《廖仲恺与广东财政（1923—1925年）》，《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⑫⑬ 刘达潮：《回忆苏兆征同志》，《广东党史资料》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